

内部发行

人文地理学

(资料汇编)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地理学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说 明

为了便于大专院校地理科系师生、中学地理教师、高校地理专业研究生、函授生讲授和学习《人文地理学》有关内容，并考虑到目前国内还缺少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材料的实际情况。我会决定，以教育部委托中国地理学会今年暑期在北京举办的人文地理研究班上各专家教授的讲稿为主，辑成这本《人文地理学资料汇编》。

汇编虽力图对人文地理学的科学体系及其分支学科的对象、任务和内容，以及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有较完整、概括的反映，但因受编者水平、资料和篇幅等限制，难免有错漏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由于编印时间短促，各稿在付梓前均未能请作者审阅，如有错误，乃系编者责任，并向原作者致以歉意！

编者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齐齐哈尔市

目 录

1、人文地理学导言	李旭旦 (1)
2、人地关系论	李振泉 (15)
3、新技术革命与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	张文奎 (24)
4、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	吴传钧 (31)
5、再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张文奎 (46)
6、人口地理学概观	王嗣均 (53)
7、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方向	于洪俊 · 宁越敏 (67)
8、农村聚落地理	金其铭 (72)
9、关于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鲍觉民 (92)
10、地缘政治学：西方政治地理学中最重要流派	张文奎 (96)
11、文化地理学与现代化建设	钱今昔 (115)
12、应重视文化地理的研究	钱今昔 (119)
13、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旅游地理学	郭来喜 (123)
14、西方行为地理学的发展和现状	张文奎 (137)
15、在全国国土整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徐 青 (145)
16、战后日本的国土开发及其问题	(日) 河野通博 (159)

人文地理学导言

南京师大地理系 李旭旦

一、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

一般地说,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相互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三十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五十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但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在苏联地理学界内这种情况已于六十年代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批判了过去把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裂的错误,提出了现代地理学应是统一的地理学的新观点;并且认识到把非经济的社会现象排除在经济地理研究对象之外是不妥当的。从而加强了重视社会化的倾向,把原来的经济地理学扩大了研究内容,并改称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等同于人文地理学),把非经济方面的社会要素,如社会文化、政治、历史、人口和聚落等的空间分布的描述与解释及其合理规划与分布等问题,都作为其研究内容。八十年代的很多苏联地理学新秀明确主张社会经济地理的各个部门相互结合,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综合地统一起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人称此为建设地理学。

至于在英、法、美、日等诸西方国家内,人文地理是一直被重视的。在日本,人文地理实际上就是大学地理系的主要课程。在英美各国,近二十年来,经过计量革命与结合社会福利的运动已普遍地采用模型方法,着重研究有关人民生活的问题。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

1980年以后,我国多数地理学者也发出了要大力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呼吁,要求加强这门已被长期忽视,大部分已是十分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学科,目前在原有的经济地理、历史地理的研究基础上,已经开始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与旅游地理方面的工作。对政治地理、社会文化地理、民族地理、农村地理、行为地理等空白点也应逐步进行弥补或探索。

1982年在我国公布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已把人文地理列为要加强研究的薄弱学科之一。社会科学院及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也一再提到过去被忽视的重要学科(其中包括人文地理)要积极恢复和加强。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在杭州举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人文地理学讨论会,会上回顾了我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程,介绍了国外人文地理研

究的新动向,设想了今后我国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前景,并为此成立了开展有关学术工作的筹备组。1983年5月又在南宁再次举行了人文地理讨论会,参加代表近90人,会议强调了开展非经济方面的人文地理分支研究如政治地理、农村地理、民族地理、社会地理等和应用计量方法的必要性。讨论中,代表们还认真学习了胡乔木同志于1983年2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必须掌握文化知识课程,如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都要知道。人文地理在苏联叫经济地理,但是,严格的说起来,人文地理要比经济地理的范围广泛得多,仅仅知道经济地理,我们的干部到什么地方去只考虑经济,对于其他的问题都没有兴趣,也没有知识。”这一讲话使代表们深受鼓舞和鞭策。会议一致建议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以促进工作的开展,并建议大学地理系内开设人文地理课程。1984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响应教育部的建议,决定于1984年7月在北京开办人文地理学讲习班,为大学地理系开设人文地理课程创造条件。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为适应目前对开展人文地理研究的需要,决定提前编写并出版人文地理学分册。早在1980年4月起即召开会议确定编写条目聘定撰写人选,开始进行工作。在四年余的时间内,聚集了国内有关专家的共同力量,对条目通过多次讨论与修改,并经反复审阅,终于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稿本,先行出版,以应当前之急需。由于历时三十五年我国地理学界对这门学科中部分园地的荒弃,在内容上仍不得不偏重于经济地理部分,这是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反映;但它不失为我国目前唯一可供参考的人文地理著作。

有人认为:近年来在我国,人文地理这门学科已早失传,经济地理学实际上已代替了人文地理学,从而主张可把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加以逐步扩展,把人口地理学、都市地理学、农村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旅游地理学都包括在内,这样就没有重提复兴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的必要了。对此,我个人不敢苟同。我认为,这门学科之所以衰落与失散,是解放以来我国片面地学习当时的苏联把地理学分裂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所招致的后果。苏联已于六十年代内纠正了这个错误,现在我们却仍然承袭着这一错误,而不予改正,这是不妥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在解放前的我国早已引入并存在,即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一向被重视的。

近代科学分工日益精专,有些学科已仅存在一个名称。例如物理学,现在已没有一个人自称为全能的物理学家了。它早已分为力学、电学、光学、热学、声学等,甚至更为细密。地理学也是如此,即以自然地理学而言,也已经没有人自称为全面的自然地理学家了;它已分为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地理学、生物地理等分支。单是其中的地貌学一个分支而言,现在又已进一步分工为喀斯特地貌、冰川地貌、沙流地貌、沙漠地貌,甚至泥石流地貌等专业。经济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和地貌学与自然地理学的关系一样,不论它的发展如何迅速膨大,它仍然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经济地理学的不能囊括人文地理学,正如地貌学的不能囊括自然地理学一样,这个道理是非常浅显的,事实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恢复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并不是削弱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相反,它将有助于使经济地理在其合理范围内按照它的社会化方向,开展的更为生动。恢复人文地理学这一学科,有利于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社会化,有利于这门学科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建设服务。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能因为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与技术化倾向,而把人文地理学说成是数学或技术科学,这一点应该也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分久必合已成为现代科学的新方向,科学研究除继续细密分工外,统一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正在抬头。

二、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又称人生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科学。人文地理着重研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或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由于人地关系论点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进化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要正确进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探讨人地关系观点的历史演变。

中国自古以来,对人地关系就有种种论点。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古代九洲的地理环境以及方域、土壤、物产田赋、交通等情况,可以称为一部带有方志雏形的地理著作。《周易》(殷周战国时期)提出过“视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论点。先秦著作《礼记·王制》篇中指出了:“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这就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孟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年)进一步提出了天人相关论,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在他的《天论》篇中发表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参”指人在对自然斗争中的努力)的精辟言论。管仲(公元前?~前645年)《地员》篇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东汉王充(公元27~约97)的《论衡·明雩》篇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主张人和地各有规律,反对人和地关系的绝对化。北魏贾思勰(6世纪)在他的《齐民要术一种谷第三》(约533~544年)中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说法,已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因地制宜”四字虽是《隋书·经籍志》656年才提出来的,但这种思想却早已为前人所重视。唐刘禹锡(772~842)主张人地相关论,认为:“天与人相交胜”、“还相用”。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1631~1692)的《读史方典纪要》都讨论了各地区的人地关联问题。《读史方典纪要》虽然讲的是关山险隘,却一再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清刘鹗庄(1648~1695年)认为治学要解决实际问题及“天地之故”,即要求以人地关系的研究来分析学术问题。但在中国古代并无系统的人文地理著作,人文地理作为一学科则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

在西方，地理学一向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在古代的希腊、罗马直到伊斯兰教世界，如埃拉托色尼(Erathosthenes of Cyrene, 约公元前273~前192)、斯特拉波(Strabo, 约公元前63~约公元19)，和伊德列西(Ibn Abdullāh Muḥammad ibn Idrīsī, 1099~1164)等，曾有不少人地关系的论述。但自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后，神学代替了一切。直至19世纪后期，地理科学才开始形成地文、人文及区域三大分支。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的A. 洪堡(Humboldt, 1769~1859)和K. 李特尔(Karl Ritter, 1779~1859)都为地文和人文地理的研究开创了早期理论。

李特尔用经验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地各种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在他的《地学》(Erdkunde, 共十九卷) (1822~1859)一书中，探讨世界各地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认为自然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他应当被推为区域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但他常常把人地关系归从于神的意旨，从而被后人诟病为“目的论”。

其后，对环绕人地关系观点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各家见解不一，但大致可以按出现的先后，依次归纳为环境决定论、二元论、或然论、适应论、人类生态、文化景观论等，以至今日的和谐论。

按历史演变，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下列5种论点：

(一) 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把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在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强调了地区特征、特别是气候对制定法律的影响。他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弱，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1881年英国历史学者H. T. 巴克尔(Buckle, 1821~1862)在他的《英国文明的历史》(1857)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自然法则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气质的影响，并把个人和民族特征归之于自然条件的效果。他说：“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印度)使人产生一种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如在希腊)时，就使人早期发展了理智”。他又说：“生活在极北纬度的人民从来不曾有过温带地区居民那样卓越的稳定的事业”；还进一步论证气候不仅刺激人或使人衰弱，也对人的工作与能力的坚定性产生影响。

德国地理学者F. 拉采尔(Ratzel, 1844~1904)一向被公认为环境决定论的倡导者。他深受当时C. R. 达尔文(Darwin, 1809~1882)进化论的影响，在他的《人类地理学》(1882~1892)一书中，把人说成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他的学生E. C. 森普尔(Semple 1863~1932)进一步把拉采尔这一思想传播到美国，广为宣扬并大加发挥。其后，美国地理学者E. 亨丁顿(Huntington, 1876~1947)在他的《气候与文明》(1915)一书中，特

别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

拉采尔虽然论述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也提出过“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但他“是所有对人文地理学有贡献的人中最伟大的一位”(英R. 迪金森语Rober Dickison, 1905~),也是第一个系统地说明文化景观概念的人。后人对他的决定论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也不应当抹煞他对人文地理学的贡献。在1938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 H. 洛威(Robert Heinruk Lowie, 1883~1957)的《人类学理论史》一书中为拉采尔作过不平之鸣。他认为:拉采尔没有夸大过自然环境的力量,实际上他曾一再告诫人们要提防这个陷阱……没有人曾比拉采尔更多地强调过历史的力量”。可见,对拉桑尔的评价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二)二元论(Dualism)在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先驱逝世以后,地理学的一元性就受到了非议。洪堡曾主张地理学应在复杂性中去理解统一性,李特尔认为统一性正是地理学的特点。但是,以德国O. 佩舍尔(Oscar Peschel, 1826~1875)为首的一些人却反对李特尔的统一方向,认为地理学只能是对地球表面形态的研究,而人类活动则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样,就出现了地理学上的二元论,连同F. 李希霍芬(Fercinand Freiberrvon Richthofen, 1833~1905)和A. 彭克(Albrecht Penck, 1858~1945)都把地理学限于自然地理方面,而摒弃了人文方向。

佩舍尔本人虽然主张把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地表自然形态,然而他却写过一本关于人种学的书,讲述了人类的种族与风俗,但并未讨论人文现象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地理学的二元论者实际人数不多,时间亦不长。1942年,英国地理学者H. J. 麦金德(Mackinder, 1861~1947)就说过:“地理学成功的发展道路需要将它当作一门统一的科学,虽则它包括很复杂的现象。”1961年苏联地理学者A. 阿努钦(В. А. Анучин, 1913~)批评为30年来苏联地理界分裂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二元论,主张区域研究应谋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间的联系与平衡,得到了许多学者如萨乌式金(Ю. Т. Сауісскнн, 1911~1982)和马尔科夫(К. К. Маркоя, 1905~)等人的热烈赞同。1970年,英国地理学者C. A. 费谢尔(Fisner, 1916~1981)著文号召恢复以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主旨的区域地理学,并认为它是地理学的当然核心。1980年在苏联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马尔科夫发表了《现代地理学》一文,指出:“统一地理学或简称地理学,就是现代地理学。”二元论在地理学思想上虽不是长期的,普遍的,所占的地位也是不重要的,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三)或然论又称可能论 在拉采尔之后,德国出现了对二元论的反作用,法国却有许多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指责拉采尔忽视了社会因素。例如,人类学者H. W. Marrett认为拉采尔的概括性论断是“太漂亮了,但不真实”,因为人不能被自然之手所摆弄;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具有一种社会传统,他的活动并不是直接由他的环境所决定的。

法国地理学先驱 P. 维达尔 (Paut 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 既反对拉采尔的一元论, 也不同意佩舍尔的二元论。在人地关系观点上另成一派, 后人称之为或然论或可能论。维达尔认为地理学的目的是研究地面相关现象的因果;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 除了环境的直接影响外, 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人是一个积极因素, 不能用环境控制来解释一切人生事实。在他的《人文地理学原理》(1922) 一书中说, “地质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桥梁是由地理学架起来的。地理学为了交换它从其它科学得到的帮助所能贡献的共同财富不是去分裂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而是去理解我们周围的地域环境或他们所处环境中的事实的相应性和联系性”。维达尔把地理学的重心从自然转移到人这个积极力量, 认为人类生活方式不完全是环境统治的产物, 而是各种因素 (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 的复合体。同样的环境可以伴以不同的生活方式。环境包括着许多可能性, 它们的被利用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能力。维达尔的学生 J. 白吕纳 (Jean Brunhes, 1869~1930) 于 1907 年在洛桑大学开设了欧美各国第一个人文地理学讲座, 著有《人地学原理》(1925, 第三版) 一书, 以十分严谨的态度把人生地理事实分为三纲六目。即①地面上建设事业的非生产者——房屋与道路; ②动植物的利用事业——耕种与畜牧; ③经济上的破坏事业——动植物的滥杀滥伐和矿产的开掘。他在书中举了几个小区域作为例证来阐明人地相关原理的具体应用。在书的最后述及人种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各分支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并殿以《地学精神》一章, 指出心理因素是地理事实的源泉, 是人类与自然的媒介和一切行为的指导者。他说: “心理因素是随不同社会和时代而变迁的; 人们可以按心理的动力在同一自然环境中不断创造出不同的人生事实来”。他认为: “自然是固定的, 人文是无定的, 两者之间的关系常随时代而变化。”

人文地理学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H. I. 费动 (Herbert I. Fildes, 1877~1969) 把法国学派这些论点传入英国。他有一句精采的结论: “没有必然的需要性, 但到处有可能性, 而人作为可能性的主人, 才是利用可能性的主宰。”

(四) 适当论与生态论 法国学派的人地关系论在英国受到重视。利物浦大学教授 P. M. 罗士培 (Roxby, 1880~1947) 创用了 Adjustment (协调) 一词。他在 1930 年英国科协地理组年会的主席致辞中给人文地理学以新的概念、范畴和目的。在他看来, 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 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群及其他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Adjustment 一词既意味着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 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的可能性。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双方面的相互关系, 内容可分为 4 个主要部分: 即人种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他们都是论述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适应力的。历史地理学则是演变中的人文地理学。

与此同时, 美国地理学者 H. H. 巴罗斯 (Barrows, 1877~1960) 却提出了人文地理是研究人类的生态的观点。他在 1924 年美国地理学者协会会刊 (Vol. 13, P. 1~14)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把地理学称为“人类生态学”。他主张地理学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 而是研究人类对

自然环境的反应。人是中心论题，一切其它现象只是当它们涉及到人和它们的反应时才予以说明。他认为历史学研究人类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则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他说：“在自然地理创立以后，一种使之人生化的坚决要求跟着就提出来了。这个要求得到了及时的反应，地理领域的中心从极端自然方面稳步移到人文方面，直到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把他们的论题规定为完全论述人与自然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影响”。

(五)文化景观论，美国地理学者C. O. 索尔(Sauer, 1889~1975)于1925年就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系主任时，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景观的形态”一文。他承受了德国O. 施吕特(Schultze, 1872~1952)和S. 帕萨格(Passage, 1867~1958)的思想影响，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观来研究地理特征。他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按地区联系的各种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人文事物及其在各地区的差异的学科。索尔主张以解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的研究核心。景观一词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景观论在苏联受到重视；近年来，苏联地理学者特别强调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性。

另一个美国地理学者D. S. 惠特尔西(Detuent Whittlesey, 1890~1956)在同一时期提出过“人类占用说”，认为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要去描述和解释人类的居住空间，研究一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并称此为“相继占用”。相继占用这一概念是环境决定论的对立面，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决定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他们的意义就得重新估价了。

从上述人文地理学思想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地理的统一性是思想主流，把地理学分裂为各不相关的自然与经济两个部门，以及把人文地理学排斥在地理学范畴之外，只是某一短暂时期内少数人的观点和做法，是不恰当的。

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李特尔语)。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是不能分开的(A. 赫特纳语, Hettner, 1859~1941)。1913年，英国地理学者A. O. 赫伯森(Herbertson, 1865~1915)写道：“我们不可能将一个居住区及其居民分别考虑而不从整体中减去一个主要部分。……将整体分割为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凶杀的行动。……这样分割之后，活的整体不再存在，而只是某种死的和不完整的残部了”。1922年维达尔在他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总结说：

“人文地理学因此不是一个排除人类的地理学的对立物。实际上，除了专业人员的心目之中以外，这种观点从来没有存在过”。1954年，美国地理学者P. E. 詹姆斯(James, 1899~)认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区分，模糊了而不是澄清了地理学的真正性质”。在十月革命后的30至50年代，苏联地理学界曾有一部分人重新拾起了过时的二元论，把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截然分裂，并以经济地理学替代人文地理学。可喜的是，这一情况现在已被纠正过来了。自60年代以后，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在全世界再次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上，已形成了人与环境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一词

英语为Harmony, 俄语为YAMOHUR, 日语即为“和谐”)。

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 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它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论的一大革新。1961年苏联的阿努钦在他的博士论文《地理学的理论问题》中, 强烈地驳斥了存在着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学和非自然的经济地理学的可能性, 逐步恢复了地理学统一性的观点。1970年, 英国地理学者费谢尔在其《区域地理学往何处去?》(地理学 VOI. 54, Pt. 4, 1970) 一文中, 也主张区域地理学应以分析人与环境为主旨。70年代以来, 分析并协调人和环境的关系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1980年8月底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 大会主席英国伦敦大学教授M. J. 怀斯(Wise, 1981~)在开幕词中指出: “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 环境恶化, 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 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 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 也强调要协调自然资源和人口发展的关系。

除了地理学理论上的和谐论以外, 第二项变革是方法上革新, 即所谓计量革命。1955年, 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W. L. 加里森(Garrison, 1924~)开设了个研究班, 用数学统计训练了一批地理学者。这个研究班毕业生英国的P. 哈格特(Hagget, 1933~)在1960年以后把计量方法引进了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 使地理现象分布的差异从定性进入了定量的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已能处理多种变量的复杂计算, 使地理学有可能对一些空间规律的研究应用许多新的统计方法与技术手段, 来进行精确的度量, 并用数字来表达人地关系, 说明区域差异与变化。计量革命引进了不少“模型”, 在地理学中采用模型来探讨实际问题已日益广泛。英国的K. J. 乔莱(Chorley, 1927~)和哈格特曾于1967年著有《地理学中的模型》一书以及D. 哈维(Harvey, 1935~)在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都是运用模型与计算的地理学新著。

他们指出, 按照普通系统论的原则, 一切系统具有共同的抽象特征, 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同型性, 物理学上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用来说明经济系统中的信息输送; 万有引力定律可用来说明城市间人口移动的趋势。在数学上, 生物的生长曲线与散布曲线和经济发展曲线或人口增长曲线也极为相似; 人口潜力与重力场有共同性; 水力模型与运输模型可以互用; 数学上的函数关系可取代文字上的因果说明; 运筹学可用于位置分析; 线性规划可用于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用回归分析方法可以确定两个以上相互依存的变量, 从而创立了解决多因素问题的计算方法。数学模型既能说明自然规律, 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农业、工业、运输、人口、城市等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

此外, 卫星遥感等新技术在地理学及地图上的运用也正方兴未艾。

第三项变革是地理学的研究目的应如何结合实际的关联运动。除计量革命外, 人文地理在论题内容方面也有革新。过去, 人文地理学以小区域研究, 经济区划和文化景观类型为其主要论题, 现已转到以分析解决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其主攻方向。它涉及到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贫穷与饥饿、种族歧视、资源的合理运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

题的探讨。人文地理学论题的这种方向性转变，即所谓关联运动，有人也称之为现代地理学上的理论革命。

1977年，英国D. 史密斯(Smith, 1936~)著《人文地理学》一书，作者在引言中阐明该书立意于估价各种地理情况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探讨各项政府决策对改善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史密斯运用函数方法来分析“何人在何处获何物”的问题，即用人、物、地点三组变量列为矩阵，进行计算。其中“人”包括人口、居民阶层及其经济地位和种族、民族成份等变量。“物”指生活水平指标、营养指标和各种生活福利项目，“地点”则指各级经济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区的空间分布等。他把通过计算机分析所取得的数值制成生活质量分布图，来进行定量的描述和解释，然后进一步对生活质量加以评价，为生活水平偏低的居民区开出改善的“处方”，并实行改善的措施。以上这种以计量方法来分析生活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改进人类生活为主旨的综合性区域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通常以都市为重点对象。他还探讨了三个实际问题，即世界高度发展、中度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质量的地区性比较，南非的种族歧视和美国城市社会的福利。现代人文地理学还要求根据区位配置论、中心地学说和普通系统论等原理，在城市规划，道路建设、工农业布局、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上，进行空间分析与安排。这些工作可以作为进行国土整治的参考。

以1980年8月底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为例，在人文地理方面，大会成立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历史地理、城市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5个小组，共提出论文255篇（包括复兴区域地理小组），占大会全部论文（509篇）的一半以上。并以日本文化、环境研究、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管理5个专题，进行了大会的报告与讨论。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文地理科学结合社会实际的新趋向。

以上人地关系上的统一性与和谐论，研究方法上的计量革命与技术革新，以论题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关联运动，反映出今日的人文地理学面目已焕然一新，也为今后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三、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内容

在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纯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界已成为社会化了的自然界，人化了的自然界。这是人类的伟大胜利。但在另一方面，人类和环境所处的关系却往往不协调。人们不适当地开垦土地，滥伐森林，过滥地放牧草原，造成了严重水土流失，引起了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此外，如不合理的灌溉引起土壤碱化，工业都市出现严重的三废污染等，也都是人类无视环境而受到的报复。如何协调人地关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石田宽语，1919~ ）已成为现代人文地理者参加国家建设方面的新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自然地理各部门的研究，都有显著进展；在人文地理

领域内则偏重于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各部门，结合农业生产实际的研究，也取得较大成就；但却忽视并放弃了人文地理学其它各分支的研究。因为人类生活除了生产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外，还包括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文娱活动与心理活动等。近年以来，又新兴了旅游地理等新学科，内容日益丰富。1976年法国 M. 德洛教授 (Derruau, 1920~) 的《人文地理学》一书中把人文地理的内容分为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农业地理、非农业活动 (工业、渔业、服务业、旅游业、运输业) 等。1977年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 H. J. 德伯里 (Dblig, 1935年~) 也写了一本人文地理学，继承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传统，内容分为人口、文化、居民点、生活方式和政治五大章。现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的传统内容及其新的动向分别介绍如下：

经济地理学 以叙述和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工农业的生产、消费、运输为其主要任务。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曾记述各种物产，诸如小麦棉花、金属和动力资源等的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过各种经济区域的划分。经济地理又按不同部门分为农业地理、工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学等。在经济布局的理论上，德国学者曾有过杰出贡献，如 J. H. 屠能 (Thünen, 1783~1850) 的农业区位论 (1826年提出)，A. 韦伯 (Weber, 1868~1958)、(1809年提出) 和 A. 廖什 (Losch, 1906~1945) 的工业区位论，W. 克里斯塔勒 (Christaller, 1893~1969) 的中心地学说 (创立于1933年) 所引起的指导作用均已公认。现代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倾向已涉及到市场、政府决策、社会结构对经济布局的影响。对城市经济综合体的分析也十分重视。

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地理方面成果卓著，队伍亦具规模。经济地理的研究密切结合国家建设任务。除出版多种教科书外，还进行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地理考察，写出了不少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曾主编过《中华地理志》的《经济地理丛书》(1956~1963) 和《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980) 及各省农业地理。农业区划目前仍然列为国家科研任务的首项。关于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也在《地理学报》上发表过不少论著。《全国百万分之一土地利用图》亦正在编制中。在工业地理方面的工作则集中在安徽、山东煤田，河北、辽宁、湖南的钢铁业以及山东的石油区等。

关于能源、交通线、工业城市和工业区的布局目前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世界各国如日本、法国、捷克等都十分重视国土整治的问题，并形成了一门称为国土经济学的新学科。中国对国土整治也开始重视。但整治国土必须对国土的自然和人文各方面首先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了解。不但要了解一个需要整治的地区 (如黄土高原) 的自然资源，也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市场与劳动力、居民生活水平与风俗习惯等情况，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作出正确的治理决策。

人口地理学 是研究人类居住在地球上的差异性。它的内容包括人口增长，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与密度、人口迁移、人口部门结构和人口问题等。法国人口地理学者 B. 加尼尔 (Garnier) 认为：“人口地理学是描述现在地理环境条件下人口的事实和状况，分析构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进一步将世界人口分布、人类社会的演进和人类成就的程度加以深入的研究”。1970年美国宾洲大学地理系教授 W. 齐林

斯基 (Zelinski, 1921~) 把人口地理的研究分成三个方面, 即描述人口分布的特点, 分析人口分布及空间上的表现形态以及分析造成这种形态和特征的相关因素。齐林斯基着重指出了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严重后果, 认为这种人口增长综合病症的出现将成为 21 世纪人类的隐忧。如何使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人口增长相协调, 如何控制人口的无限度增长, 根据自然资源的开发可能和经济技术条件的水平, 保持, 一个地区的适度人口, 已成为人口地理学者的新课题。近年来, 中国对人口问题十分重视: 一面大力从事经济建设, 一面严格节制生育, 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已成为重要的国策。

城市地理学 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区域, 居民集中, 房屋街道的结构与城市的功能也具有各种特征。城市往往是一国一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现今世界城市人口比重日益增高, 许多国家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城市地理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研究城市, 一般从分析其地理条件, 追溯其历史发展起源开始, 主要内容应包括城市的形成与成长过程、城市的功能与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及其贸易腹地范围、城市的人口与民族构成, 城市的类型与规划等。欧洲和日本的传统是研究城市的形态 (布局和建筑物), 美国则较多注意于城市社会、商业、服务业和工业的空间变化模式等方面, 例如商业及服务业的结构、城市社会系统的类型, 黑人、犹太人及其移民区的形成以及城市内外人群的迁移等课题。许多新的计量技术最先应用到城市地理学的研究, 它在地理学中应用数学模式亦最早最多。在社会主义国家内, 城市地理学者按国家的政策参加规划工作尤为重要。中国的城市政策以控制大城市, 发展中、小城市为方针, 并根据城市的不同功能来规划其空间结构。

政治地理学 领土、国民和政权是国家三大要素。政治地理学者通过研究国民与领土的关系来分析政治现象的地域体系。政治地理学 (包括地缘政治 Geopolitik) 一度曾是人文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德国的拉采尔, 瑞典的 R. 克伦 (Kjellen, 1846~1922) 和英国的麦金德和美国的 I. 鲍曼 (Bowman, 1878~1950) 曾对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发表过论述, 如拉采尔的国家有机说和生存空间论, 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 鲍曼的民族自决论等。荷兰地理学者 S. V. 范根堡 (Valkenburg, 1891~1976) 曾于 1931 年著《政治地理学》一书, 提出过所谓国运轮回说。到了 30 年代后期, 这些论说被纳粹德国御用学者 K. 豪斯浩佛 (Haushofer, 1869~1946) 歪曲利用来为他们法西斯侵略政策服务, 从而地缘政治一词遭受到后代地理学者摒弃和谴责。

政治地理学在今日应与政治学和历史学配合, 除研究国家和地区外, 也注意到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宗教为背景的各种国家集团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共同市场、华沙条约国和经互会、东南亚同盟、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国家组织、阿拉伯联盟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它们在保卫世界和平、国际互助的名义下, 以超国家的力量相互角逐。

政治疆界的分析及其改变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政治区域的演变、结构和功能也是

如此。现代分析技术及模式的应用已引导人们去测定各类各级政治区域的效率和效果。近年来，西方各国地理学者对政治行为和政府决策的地理背景具有新的兴趣。例如，政治地理学者研究了国土整治的决策、首都的定位，大都市区的结构、国家公园的设置、选票模式地域分布以及诸如领海界线和领海捕鱼权等课题。

社会文化地理学 简称社会地理学，亦即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类型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其间的相互关系。社会类型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特定生活方式，是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映。社会地理学在探讨人地关系中重视人口、民族、宗教、语言等社会文化条件，强调社会因素对地区文化的影响。这些传统仍然重要，并且由于应用了更为先进的制图与计量方法而有所创新。社会地理学的另一内容是在各种社会因素下的聚落分布与型式。近年来，由于人口向城市集中，原属社会地理学内容之一的城市地理已独立成为一支学科。在美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方向已转到种族问题（黑人、犹太人、印第安人等）、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问题，贫富不均与犯罪等社会问题的探讨，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加以分析。例如，在瑞典地理学者 T. 哈斯特朗（ ， 1916 ~ ）的影响下，特别注意于特定过程与现象的决策和地区行动模式的分布。在苏联，社会地理学也日益被重视，萨乌式金主张：“经济和社会地理学应建立在深入研究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生活链的相互基础上，并极力推动地理学的社会化”。

历史地理学 很早就成为地理学的一门独立分支，以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历史地理学者的任务，不仅要研究政区建置的沿革，并且要复原历史时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仅要研究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地理演变，并且要探索这种演变的规律性。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开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其中如英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等，均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

中国拥有大量的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理学者利用这些丰富资料，进行沿革地理的研究，已有悠久历史。1949年以来，又通过历史文献的分析和野外实地考察从事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1974）等。近年来，已开始应用诸如孢粉分析、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航空和航天照片判读等新的科学技术方法。今后，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加强新的科学技术方法运用，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重要任务。

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还有旅游地理、聚落地理、感应地理、行为地理与生态地理等。旅游地理研究旅游资源、地点、路线、季节内容等，是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大有发展前途。聚落地理比较古老，探讨聚落起源、成长与发展，与人口和城市地理关系较密。感应地理与行为地理学是地理学与心理学间新兴的边缘科学，它研究不同地区人类行为的心理差异与分布、行为的环境系统、人类生活对环境的感应以及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等。目前能根据调查资料，应用新技术、编制出各种社会集团的意境地图（Mental maps）。人们对环境发生感应后，作出判断，考虑如何去适应或改造环境，以达到人与环境相协调的目的，这是行为地理学的研究任务。这一学科在70年代以后才开始兴起。

四、如何开展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随同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发表，1981年12月1日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五届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各级学校都要加强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育，这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1981年起，凡已改为六年制的我国中学均已在高中开地理课，并以说明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基本内容，部分小学已开设了地理课。在已经发表的六五计划中要求我们加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面对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科人少事多的局面，我们应该怎样响应国家的号召呢？

通过地理教育不仅在各级学校内能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它对国家的四化建设特别是有关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布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发展农业经济就需要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包括土地、水热、生物等资源)和社会条件(如经济基础结构、人口与劳动力、民族风习、文化特征、耕作制度与历史背景等)来因地制宜地利用土地、实行合理的有效的区域分工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以求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我国地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的质量差异很大；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技术经济水平也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对各地的人地关系进行具体分析，除了调查考察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外，还要分析各地的人文地理特征，然后才能建立人类不把自然当作敌人而是和自然交朋友的和谐关系，以加速四化建设，让青年干部理解这些道理，在他们的工作中就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1984年三月于南京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上，我曾引用过陈云同志对文艺界的讲话里所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三点指示，认为这三点指示也可作为今后我国人文地理学工作所应遵循的方向。首先是“出人”的问题。要大力开展已被抛弃了三十五年的人文地理学，目前最严重的是缺人的问题。不少青年地理学者几乎连什么是人文地理学都没有听说过，没有人当然无法进行工作，所以首先要“出人”。“出人”可采取多种办法，也可采用多种渠道。比如，可在有条件的大学地理系招收研究生进行培养，也可在全国范围由教育部开办短期讲习班等。招研究生是较好的办法，但有远水解不了近渴之患，开讲习班可以出人快些。

第二是“出书”，目前国内迄今还没有一本系统地讲人文地理学的书，使许多有志于自修人文地理学的青年同志也苦于没有书可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地理卷已花了四年余时间编写了一本人文地理学条目，今决定以“分册”形式提前出版，以应亟需，它可能就是我国即将问世的第一本参考读物了。科学出版社也拟出版一本《人文地理学概论》，我们正在加紧组稿。创办人文地理期刊也很有必要。如果在办了讲习班以后，把讲义材料加以整理，编出一本人文地理学教科书也是十分可能的。总之一切事在人为。

第三是“走正路”。搞文艺要走正路，开展人文地理的研究也有走正路的问题。人文地理研究的对象离不开人，要讲人和环境的关系，这就必然涉及到许多哲学问题，需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为准则。现在我们从西方引进的人文地理学论述中会不会有歪门邪道呢？我看是会有的。当前，我国新人文地理学正当起

步，走向复兴，特别要警惕这点。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应当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在学习国外的人文地理学时，切忌采取拿来主义，照搬照抄，要使人文地理学为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我认为既要大胆引进，又要加以分析批判，要有分析地引进，要有批判地吸收。国外人文地理学派林立，有美国的，有英国的有苏联的，有老一套，也有新花样。观点不一，说法纷纭。我们在学习引进过程中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再象五十年代初期那样一边倒，不能重蹈复辙。

最后，我愿向国内有志于开展人文地理学工作的同志们提出四点建议，请求指正：

一、要在认识上逐步取得一致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内容以及其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问题。目前在我国地理界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同观点和论说，这是毋庸讳言的，也是不足为奇的。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可以用双百方针进行争鸣，辩明是非，实事求是，以谋逐步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不能也可以保留不同的学派。但我认为不应为此而树立各自的阵营，把具有不同的观点的学派形成相互对立的宗派，而进行相互攻击，因为这样做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的。

二、要把研究专题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

按有关专题从事人文地理工作必须首先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与具体任务紧密结合。例如，近年来，有关人口地理的研究就是和控制人口的增长和合理的人口安排相结合的。但这决不是只要把东南沿海区的稠密人口迁向西北空旷区以求平衡，把大城市的人口迁向小集镇这几个简单办法所能解决的。必须在经济落后的内地调查并根据其自然条件，实行国土的合理利用与整理，大力开发自然资源，改善交通条件，发展工、矿、农、牧业，促进民族文化与科学教育等各方面有政策、有计划地进行大量工作，才能取得成就。

城市地理及农村聚落地理的研究专题也同样需要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按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况，实行不同的改革政策。

三、要采取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

人文地理的研究不是靠写空洞文章，高谈阔论就算了事，它必须按具体问题首先从事实地考察，以取得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论证，作为决定政府的政策参考。例如，切实地进行农村地理研究，就必须进行定点定期土地利用调查与制图，考察农村人口与聚落分布的变化过程，才能预测今后农村地理面貌的未来。

四、要大胆创新，向我国目前人文地理学领域内的薄弱环节进军，以填补多年来没有接触过的空白或荒废园地。例如，有关政治地理学方面的国际领土纠纷问题和自元代以来已承袭了近四百余年的国内行政区划，如何调整等问题虽然十分亟需进行研究，却还有人敢于闢攻。少数民族在四化建设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国际边界和国内设立特区以及军事国防地理等课题看来也很少有人问津。研究这些问题可能会遇到资料上的困难，牵涉到不明政策的种种顾虑；但是，我想这些问题是应该进行研究的，任何困难与顾虑都不能成为我们对这些专题置之不顾的理由。

1984年5月